

## 第一章

# 世界开放指数：概念与理论

现代文明是在世界各国开放交流中不断发展的。各个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选择适合自身的开放水平和开放路径。从历史来看，**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解决时代发展难题的关键一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之源**。过去数十年来，整个世界已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开放发展已成为基本共识。描述世界各国的开放程度，分析其趋势、阐释其原因、探究其影响，是学界、政界和大众关注的重要议题。

### 一 对外开放的概念

在现有文献中，对外开放的基本含义是明确且一致的，即至少两个经济体的特定主体之间展开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上的交往，形成货物、服务、人员、资金、信息、知识、技术等流动，以促进各自的发展。不过，关于对外开放概念的外延，各种文献往往具有多样化的设定。

对外开放的主体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主体**，指基于地理范畴、领土或主权内涵的特定经济体（即1个国家或地区）或区域（含至少2个经济体）。比如，经济体A同经济体B之间进行开放，东亚同南亚、亚洲同欧洲之间进行开放。二是**中观层面的主体**，主要指组成国民经济的机构部门。如政府部门（含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子部门和住户部门，如中国金融部门对外开放。有时也指产业部门（分类或粗或细）或行政层

级（如省、市、县等），如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或北京市对外开放。三是微观层面的主体，主要指企业和个人。如中国华为公司投资欧洲、外国居民到中国留学或旅游。相应地，每类主体都有自己的对外开放。这三个层次之间存在自上而下的交叉嵌套和自下而上的交会加总关系，彼此之间并不是独立的。本报告所称对外开放的主体，主要指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即特定的经济体。这意味着开放指数以整个经济体为基本观察单元。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主体暂未纳入本报告当前关注范围。

对外开放的客体，主要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大类，其中现有相关文献涉及最多的跨境经济开放，主要有跨境社会开放和跨境文化开放，考虑到政治的主权性和内部性等特点，很少有文献定义跨境政治开放。跨境开放特别是跨境经济开放，与一些广为人知的概念存在很强的关联。最主要的有全球化、区域化、国际化。其他还有互联性、相依性、自由度（化）等。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性质、起源、分期等，相关文献浩如烟海，众多政治家、企业领袖、国际机构与学者有过种种描述。全球化的首要关键词是“全球”，指整个地球，至少指多数大洲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化”，即特定变化（change/turn/transform）趋势。“全球化”包含着跨境开放交流，从少数向多数大洲的多数国家和地区扩展变化的趋势。仅限于某大洲内或者少数大洲诸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开放交流是区域化，而非全球化。在大多数场合，全球化事实上都被当作“经济全球化”的同义语，代表性的定义如下。一是经济全球化指市场不断国际化。这里的“市场”是广义的，包括商品（货物与服务）、企业和产业、技术和竞争等部分。二是经济全球化指人类经济上的相互影响渗透不断提升，包括器物（货物、服务、劳动、资金和技术等）、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同时，无论是缘起、发展过程还是种种损益，经济全球化始终伴随着争议，“亲全球主义者”和“反全球主义者”为此激烈辩论至少20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更甚。国际化，是开放交流发生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趋势。国家或地区之间，指的是至少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至于发生在多少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则无须明确。当然，交流如发生在特定大洲内特定区域（比如东亚）的多数国家和地区之间，则可

界定为区域化，如发生在多数大洲的多数国家或地区之间，则可界定为全球化。

全球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内涵的首要方面是跨境开放的广度（extensity）或宽度（width / breadth），而非跨境开放的强度（intensity）或深度（depth）。但是现有相关指数却主要测度跨境开放的强度或深度，出现了相关概念与内涵的错位。

## 专栏 1-1 跨境开放相关的其他概念

### 1. 联通性和互联性

联通性（connectedness）指一国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结和通畅程度，可描述为对产品和服务、资本、信息、人的国际流动的参与。在全球范围的联通性即全球联通性，与此相对应的概念自然是区域联通性和本地联通性。DHL 开发的全球联通性指数称，全球化就是全球联通性，即跨境关系的集中度（concentration of relationships across borders）：一国的国际联通中如果较小国家较多，则其全球化水平较低；反之则较高，同区位或地理距离无关。

另一个相关概念是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从英文词源看，互联性隶属于联通性。一般用作“互联经济体”（interconnected economies），主要指不同国家之间相互的经济联系，包括商品、金融（含投资）、劳动力、信息（尤其是知识）的国际流动或传播。

### 2. 相依性

“相依性”或“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在世界经济领域流行了，指一国同其他国家之间通过贸易、货币与金融（含资本）、举债渠道发生的相互依赖性关系。其中的“其他国家”可以在不同的地理范围内进一步界定。不同国家之间依赖关系对称与否，并未在该名词中显性化，实际上存在非对称相依或失衡，这在水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领域很早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 3. 自由度（化）

自由或自由度主要指中观或微观层面上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趋

势，特别指政府同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趋势。结合具体的领域，自由相关概念包括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等。美国传统基金会开发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IEF）称，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是每个人控制自己劳动和财产的基本权利：在一个经济自由的社会里，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生产、消费和投资；政府允许劳动力、资本和货物自由流动，在保护和维持自由本身所必需的范围之外，不强迫或限制自由。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zer Institute）开发的人类自由指数（Human Freedom Index, HFI）和世界经济自由指数（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EFW）均称，“个人在如下情况下具有经济自由：不使用武力、欺诈或盗窃而获得的财产，免受他人侵犯，且有使用、交换或给予他人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不侵犯他人同样的权利。因此，当存在自愿交换、竞争、个人选择和个人及其财产保护时，经济自由就存在”。这两个经济自由指数测度的是微观个体尺度上的自由。显然，这里讨论的自由度是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自由选择权。

另一相关概念是自由化（liberalization），即政府对企业行为放松管制的趋势（《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参见Smith, 2020<sup>①</sup>）。该概念有时同社会事务相关法律的放宽有关，但最常被用作一个经济术语，特别是指减少对国际贸易和资本的限制。显然，自由化既包括对内联系的自由化，也包括对外联系的自由化。与对外开放相关的“自由”主要指特定经济体的本土主体同国外主体（境外的政府、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住户，或这些主体的联合体）之间的权力分配。这只是上述“自由”概念外延中的小部分，即跨境自由。跨境自由化在刺激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外汇和投资组合，以及大规模增长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

① Smith, N., “Liberalizatio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20.

## 二 对外开放的理论

在迄今为止的全球实践中，经济是对外开放最主要的领域，社会、文化和政治是对外开放相对次要的领域。因此，本报告的测度内容以跨境经济开放为主，以跨境社会开放和跨境文化开放为辅，而且将后二者的测度限定于同跨境经济开放相关的内容。这是因为，人们即使能够将跨境开放行为明确且清晰地划分为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开放，这四个领域的内容各自仍然是纷繁复杂的，要分别详尽地测度每个领域的开放内容，依然面临巨大的甚至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地，跨境政治开放的定义及其同境内外经济、文化、社会等开放之间的最优形式，仍待深入研究。

“经济开放”，作为一个词汇，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经济开放的历史则要长久得多，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开放经济原因与结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关注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自由贸易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析的重点最初是商品交换和汇率，目前更多的是经济开放对国内经济体系的影响。按传统的测度，一般而言，经济体的经济开放程度同其规模特别是人口规模是负相关的：大国倾向于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这在过去会导致通过保护达到经济自给自足，现在这些保护则因国际治理的发展（如GATT和WTO）而得到缓解<sup>①</sup>。在中国思想史中，“淮南子—司马迁定理”，即“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特别是跨境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如下三大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sup>②</sup>。

---

<sup>①</sup> Keman, H., “Economic Opennes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economic-openness>, 2020.

<sup>②</sup> 张宇燕：《中国对外开放40周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版。

### （一）对外开放度的U形演进假说

大多数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随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一种U形变化。在没有进入工业化过程之前，开放水平很高，而一旦要发展本地的产业和企业，推动工业化进程，则需要相当长一段保护时期，保护当地的幼稚产业，这样，对外开放的水平就会降低。随着当地企业和产业竞争能力的提高，该经济体的开放水平也会逐渐增加，甚至进入自由放任的状态。

为什么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会是这样的一条U形演进路径呢？首先，落后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向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学习并建立本土产业的过程。因此，采取完全封闭的经济政策，会阻断该国与先进国家的联系，阻碍先进科学技术以及机器设备的输入，从而会被现代文明所抛弃。其次，是不是落后国家，又要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放任自流的开放政策呢？也不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实行完全的开放政策，该国会在国际竞争中，甚至是在本地市场的竞争中，完败于发达国家，当地幼稚的近现代产业会被压制，并处在供应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很难发展起来。这时，实行可控的有限度的开放，比如内向型，或者外向型经济都是比较好的选择。最后，只有在本国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达到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水平的时候，则可以逐步提高开放程度，实现开放经济。这样，伴随整个经济发展进程，该国的开放程度会呈U形变化。

### （二）不同规模经济体开放的路径选择

是不是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都会经历这样的U形变化轨迹呢？不尽然，因为国家之间、经济体之间的差别很大。

现代文明是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基础的，现代世界经济的主体也是民族国家及其衍生的经济体。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民族国家及其衍生的经济体，千差万别。有像俄罗斯那样横跨欧亚大陆6个时区的庞大国家，也有像梵蒂冈那样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迷你小国；既有像印度、中国那样约十四亿人口的

超级大国家，也有像梵蒂冈、摩纳哥那样人口不足10万的微型国家，等等。如果将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观察，我们会发现：既有人口稀少的地域大国，比如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有人口密集的集约型国家，比如日本、越南、印度等。不同类型国家追求发展的战略、政策选择也会大不相同。总体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超过2000万的民族国家或者地区（这里的地区特指一个民族国家内，由于种种原因，实行独立关税和经济政策的区域，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经济体，比如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才具有较大的经济影响力。我们以此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国家/地区区分为两大类：**大国和小国，或者大经济体和小经济体。**

大体上，大的经济体的开放历程是U形的，而小的经济体则不尽然。如果小的经济体选择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比如中国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以及新加坡的依赖跨国公司和外资的政策，以及其他国家采取的国际避税港政策等，那么，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的开放历程就不是U形的，而是一条开放程度不断增加的斜线，或者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的水平线。

### （三）开放轨迹的波浪形变化

当然，影响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的因素很多，并非仅有国家规模、经济发展过程这两个因素。现实中，更复杂的情形是，很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非常坎坷，断断续续，没有一个统一、清晰的轨迹。许多国家新一届政府上台都会重新调整政策，有的延续上届政府的，有的则完全推翻。即便是现有的发展水平，也是很多年、各种各样政策效果累积的结果；反过来，基于这种发展水平，未来也可能对接各种全然不同的政策选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保护主义政策，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于各种原因，又采取出口导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开放程度大幅度提升。随后，在遭受不同形式的经济或者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采取了一

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开放程度收缩。因此，这些国家的对外开放轨迹和开放程度，就呈现出一种波浪形变化的态势。只要这些国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未来还会有类似的波浪形变化。

### 三 从外贸外资看开放实践

人类具有诸多领域的对外开放实践，特别是跨境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实践。历史和现实均显示，人类对外开放实践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开放的领域，还是开放的程度；无论是开放的过程，还是开放的结果，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甚至在同一经济体的不同时代，都可能千差万别。理解对外开放的这些异同，对科学认识对外开放测度的理论、方法与结果都至关重要。本报告以人类跨境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为例来理解相应的开放实践。

#### （一）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国“最优”贸易开放制度选择，不能独立于其国内经济特征。<sup>①</sup>这是因为，贸易开放对开放国本土经济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根据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状况等差异，各国应保持与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

第一，贸易开放有利于发挥国内比较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国内总体经济增长。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互为内生，多数文献直接或间接地证明贸易开放会积极促进总体经济增长<sup>②③</sup>，贸易自由化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使“干中学”的知识积累过程效率更高，有利于发挥国内比较优势<sup>④</sup>；国内市场开放

---

① Edwards, S., “Opennes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1, No.3, pp. 1358–1393, 1993.

②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 “Trade, Innovation,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0, No.2, pp. 86–91, 1990.

③ Davis, D.,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5693, 1996.

④ Devereux, M. Growth, specializ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School of Economics, UCD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WP90/4.1990.



也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削弱国内市场垄断程度，使市场平均成本曲线下移，<sup>①②</sup>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国内经济增长。<sup>③</sup>历史事实和经验研究对此提供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各高速增长阶段基本伴随低关税率；<sup>④⑤</sup>早期，发展中国家中外向型部门扭曲较小的国家，增速超过扭曲更大的国家；<sup>⑥</sup>津巴布韦取消进口和外汇管制、降低进口税等贸易措施，显著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总收入。<sup>⑦</sup>

**第二，贸易开放通过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率的提升。**有如下两条渠道促进生产率提升。一是竞争引起生产率的优胜劣汰。贸易开放使生产效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存活下来的生产率高的企业有更高利润率，高利润率进一步吸引更多高生产率企业入驻，以此推高市场临界生产率，资源也会在不同生产率企业间发生重配，<sup>⑧</sup>从低效率企业流到高效率的贸易部门企业中，<sup>⑨</sup>尤其是流到效率更高的、外向型的、技能密集型企业中去，优胜劣汰机制激励行业平均生产率提升，也优化了国内产业结构。二是开放使厂商成本选择更丰富。贸易开放鼓励本地厂商参与国际市场交流竞争，企业管理者对生产率提升

---

① Tybout, J. and Westbrook, M. ,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dimensions of efficiency change in Mexic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39, No.1-2, pp.53-78, 1995.

② Kim, E. ,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Kor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rice protection, market power, and scale efficien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62, No.1, pp.55-83, 2000.

③ Helpman, E. and Krugman, P. ,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MIT Press, Edition 1, volume 1, number 026258087x, 1987.

④ Kindleberger, C. , *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39*, Penguin Books Ltd, New Edition, 1987.

⑤ Bhagwati, J. , *Protectioni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8.

⑥ Edwards, S. , “Opennes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31, No.3, pp.1358-1393, 1993.

⑦ Bautista, R., Lofgren, H. and Thomas, M. ,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Enhance Income Growth and Equity in Zimbabwe? The Role of Complementary Policies”, The TMD Discussion Paper No. 32, 1998.

⑧ Epifani, P. , “Trade Liberalization, Firm Performance,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icro-Level Data? ”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Vol.3, No.5, 2003.

⑨ Pavcnik, N. , “Trade Liberalization, Exit,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Evidence from Chilean Plan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9, No.1, pp.245-276, 2002.

和成本削减会有更多选择，<sup>①</sup>关税壁垒下降后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更便宜的投入，<sup>②</sup>竞争会改善资源分配效率，缓解经济扭曲，激励R&D形成促进本地福利提升。<sup>③</sup>

第三，贸易开放加速技术扩散，促进本地技术升级。开放国家有更强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sup>④</sup>不发达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可以利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积累的大量知识资本促进国内技术升级。贸易成为技术在国家之间扩散的重要渠道。<sup>⑤⑥⑦</sup>发展中国家可以进口大量中间品，获取国外技术知识外溢促进本国技术升级，<sup>⑧⑨⑩</sup>进口机械设备等资本品也能增加对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需求<sup>⑪</sup>。技术还可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发生外溢，<sup>⑫</sup>技术创新所产

---

① Krueger, A. , *Developing-Country Trade Poli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e World Bank, 1985.

② Khandelwal, A. and Topalova, P. ,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Indi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3, No.3, pp.995–1009, 1993.

③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 , “Trade,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rowth”,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5, No.2–3, pp.517–526, 1991.

④ Barro, R. and Sala-i-Martin, F. ,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Convergence,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5151, 1995.

⑤ Lichtenberg, F. and 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B. ,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 com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2, No.8, pp.1483–1491, 1998.

⑥ Keller, W. , “Trad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7, pp.7–24, 2002.

⑦ Blyde, J. , “Trade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Vol.18, No.3, pp.177–197, 2004.

⑧ Coe, D., Helpman, E. and Hoffmaister, A. , “North–South R & D Spillover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7, No.440, pp.134–149, 1997.

⑨ Acemoglu, D. , “Patterns of Skill Premi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 199–230, 2003.

⑩ Ishikawa, J. ,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an Intermediate Product”,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1, 3–10, 2007.

⑪ Gourdon, J. ,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uth–South trade matters”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58, No.4, pp.359–383, 2011.

⑫ Epifani, P. , “Trade Liberalization, Firm Performance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Micro–Level Data”,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63, 2003.

生的丰厚市场奖励进一步刺激新的技术创新和外商资本进入，<sup>①</sup>而外资授权给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有利于国内降低生产成本。<sup>②</sup>

第四，贸易开放促进就业并提升平均要素收入，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sup>③</su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sup>④</sup>、孟加拉国等<sup>⑤</sup>的经验研究证实，贸易开放有利于增加收入，并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其基础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开放经济中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价格将趋于均等<sup>⑥⑦</sup>。

贸易过度开放也会出现伤害国内产业发展、固化对外部价值链依赖、弱化国内价值链构建等问题。例如，在欧、美、日主导的价值链体系中，中国不仅面临保护主义带来的贸易制裁风险，也面临着价值链被“锁定”和“俘获”的风险。从贸易方式看，长期以来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导，从事加工代工、制造贴牌为主的生产，处于世界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很难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尽管掌握了生产技术，但全球品牌质量不高，很难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曾说过，从历史来看自由贸易是例外，保护主义才是常态<sup>⑧</sup>，尽管自由贸易比保护主义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

---

① Bustos, P., “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s, and Technology Upgrading: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MERCOSUR on Argentinian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1, No.1, pp.304–340, 2009.

② Hwang, H., Marjit, S. and Peng, C., “Trade liberaliz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ndogenous R&D”,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68, No.4, pp.1107–1119, 2016.

③ Salimi, F., Akhoondzadeh, T. and Arsalanbo, M., “The Triangl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Communications on Advanced Computational Science with Applications*, 1-15, doi:10.5899/2014/cacsa-00026, 2014.

④ Dan, B., “Equalizing Exchang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8, No.3, pp.653–679, 1993.

⑤ Munshi, F., “Does openness reduce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anel data Analysis”,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No. 241,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6.

⑥ Samuelson, P., “Summary on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8, No.3, pp.300–306, 1967.

⑦ Chipman, J.,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and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10, No.3, pp.399–406, 1969.

⑧ Felber, C., *Trading for Good: How Global Trade Can be Made to Serve People Not Money*, London: Zed Books Ltd., 2019.

社会福利扩张<sup>①</sup>，但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自由的进口贸易会伤害国内就业和企业竞争力，应当对外国商品施加进口壁垒。与极端保守主义观点不同的是，合适的贸易开放度应取决于本国经济的开放承载能力与本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保持本国经济和制度基本面所决定的开放程度，既要发挥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也要避免过度开放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伤害。

## （二）投资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遍布全球大多数经济体，对相关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论是在促进技术创新，还是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增加国际竞争力方面，都具有积极效应。其中，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

第一，FDI曾是中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处于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4%，上升到1996年最高的11.8%。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缓解了当时中国投资的资金压力，为此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生动力。<sup>②</sup>

第二，FDI促进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也体现在“质”。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1992—2001年），外资企业年均出口增长率达到27.9%，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0.8%。“入世”后，外资企业进一步成为中国出口的中坚力量，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4.6%。外商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客观上促进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

第三，FDI增加了中国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1987年，中国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与外商投资单位的就业人员只有21万人，占城镇就业人

---

<sup>①</sup> Poole, W. , “Free Trade: Why Are Economists and Noneconomists So Far Apart?” *Review*, Vol.86, No.5, pp.1-6, 2004; Mankiw, N. , *Economists Actually Agree on This: The Wisdom of Free Trad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5.

<sup>②</sup>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口的0.15%。到201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08%。从员工收入角度看，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的薪资水平较高，在1998年以来的所有年份里都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水平，在绝大多数年份里也都高于股份有限公司就业人员的薪资水平。1998年，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7倍以上，这一数字在2017年仍为1.2倍。

**第四，FDI助力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升级步伐基本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第二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力量，其对GDP的贡献率常年稳定在60%左右。外资企业在这一时期的重点行业也正是制造业。近年来，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要增长点，其在GDP中的比重从2002年的42.2%上升到2020年的54.5%。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也逐渐从第二产业移至第三产业，其流入第三产业的比重2020年达70.5%，同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并行不悖。随着外商对中国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也随之进入中国并产生一定外溢效应，有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

**第五，FDI推动了中国软环境的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要求中国的法律法规也要与之相匹配。根据统计，1979年到1985年年底，中国制定经济法律（包括行政法规和规章）300多个，其中涉外经济方面的约占1/2。<sup>①</sup>此后，与引进外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充实和完善，从“外资三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近年来，随着中国吸引外资的传统优势逐渐减弱，开放的着眼点逐渐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升级为“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当前，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已经成为保持并提高中国对外商的吸引力的重要抓手。

同时，应辩证地看待直接投资开放。直接投资开放在整体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在一些方面产生无效性甚至负面影响。一些外资企业通过兼并与收购

---

<sup>①</sup>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6》，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等方式，形成垄断；在某些“幼稚”行业，跨国公司的介入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挤压，最终导致东道国企业难以成长。FDI在资本流动方面也会对东道国的经济造成风险：外资集中涌入会推升东道国货币汇率，并有可能造成资产泡沫；外资集中撤离则会使东道国货币承受贬值压力。20世纪末，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风暴，外资的流入流出是危机形成和爆破的重要原因。当年外资的大量流入，助推了这一地区的快速发展，而缺少政府正确的引导，大量外资没有流向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产业，没有根本地改变东南亚的发展结构，而是流向了证券、房地产等行业，助成了投机资本的暴利。当流入的资金无利可图时，必然大量流出，残留奢靡之风和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加之大量引进外资导致外债加重，从而引发危机。泰国外债1992年为200亿美元，1997年货币贬值前已达860亿美元。

从全球主要国家的经验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冷战之后，全球投资开放、经济一体化是主要潮流。但各国政府对直接投资开放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相机抉择、审时度势时有发生。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FDI的态度就经历了从“投资自由化”到“中立立场”，再到“开放与监管并举”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中东石油生产国的关系紧张，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大举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及2018年后中美关系趋紧，均是美国对FDI收紧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为防止外资趁机介入，日本政府对外商来日本直接投资实行了保守政策。随着日本经济崛起，日本开始逐步放松对FDI的管制，但效果有待商榷。日本政府一直鼓励对外投资（ODI），最终成为ODI大国。

——巴西对FDI的态度经历过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巴西政府引导性地鼓励外资进入机械、汽车等制造行业。20世纪70年代，由于跨国公司的利润汇出以及贸易逆差问题愈加严重，巴西政府从国产化率、利润汇出比重等方面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进入20世纪80年代，巴西爆发债务危机，为了缓解危机带来的压力，巴西政府再次鼓励外资进入。

## 四 对外开放系统的模型框架

对外开放的经济可以形成一个“子系统”，即开放型经济，如果再为其加上国家等地理或领土范围限定，可具体化为“开放型中国经济”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等。这个系统内部可以构成一个再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最终使用四大环节。事实上，这个开放子系统并不是独立于其所属经济体的其他“非开放子系统”的，而是同后者存在千丝万缕或强或弱的联系。

经济开放领域中，历史最悠久的当属跨境交换环节，包括但不限于跨境贸易。对外经济开放长期以跨境贸易开放为主，跨境贸易的内容长期以货物为主，最近数十年来服务的比重逐渐上升，并在部分经济体接近主导地位。对外货物贸易的内容长期以初级产品和最终用品为主，后来中间品的比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部分经济体中跨境贸易的主要部分。跨境贸易其实是一国资源（含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禀赋的直接体现或者延伸。这正是国际贸易经典理论所论述的基本原理。因此，本报告以跨境贸易理论为起点构建对外开放理论模型。

如前所述，关于跨境贸易的理论有不同流派，但可以统一为同一框架，并通过设定其中不同参数来体现，换言之，跨境贸易各流派可以嵌套在同一理论框架中，后者可以兼容各流派的精华。Costinot 和 Rodríguez-Clare 提出了一个宏观框架，将各种前沿主流跨境贸易模型嵌套其中，以反映跨境贸易品价格的决定机制，其中，同跨境开放相关的自变量如下：生产成本，出口成本，双边可变贸易成本，进入伙伴经济体的固定成本，伙伴经济体进入报告经济体的成本。基于该框架，结合开放测度，本报告做出如下假设。

**1. 跨境贸易开放。**影响双边可变贸易成本的贸易开放因素包括关税率和非关税措施。跨境贸易开放既包括对最终产品贸易的开放，也包括对中间品贸易的开放。其中，跨境而来的中间品会进入伙伴经济体的生产过程，从而影响其相应生产过程的生产成本。显然，中间品贸易受中间品贸易政策的显著影响。

近二十年来，中间品贸易正逐渐成为影响贸易伙伴发展的显著因素。

**2. 跨境投资开放。**包括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和本土资本投向境外的开放。引进外资既能够缓解资金紧张，更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管理手段的“溢出效应”，提升东道国本土经济体企业的生产率。对外投资的主要作用也是充分利用境外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投资开放程度主要影响生产技术参数。

**3. 跨境金融开放。**金融开放可以降低企业出口、对外投资的融资成本，可以明显促进那些需要巨大固定成本的国际化行为。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实证研究，均强调金融制度对企业出口固定成本的影响。

**4. 跨境知识开放。**知识尤其是技术的开放能够使一国使用全球的先进技术，尤其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5. 跨境制度开放。**制度开放致力于消除国际经贸往来的制度障碍，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在制度经济学中有“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两种理论框架，而这两种理论框架在引入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型时，均可以被处理成一个“制度成本”的变量——为一系列衡量契约完善程度和产权保护力度的参数所构成的结构变量。

在纳入上述五个假设后，跨境贸易品价格的决定因素就包含了这五方面的开放因子。国际贸易各流派的统一理论框架及其详细的数理推导，参见本报告附录。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模型虽然包含了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和制度等领域的开放因子，但仍属于国际贸易模型。这与全球跨境开放的现实是十分吻合的：当前的跨境投资、金融、技术和制度开放均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但跨境贸易开放依然是世界开放中最受关注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领域，非贸易领域的跨境开放与跨境贸易开放都存在密切联系。

按上述理论模型，对外开放应测度的主要内容如下。

——**跨境贸易**，包括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货物与服务或用作最终品，或用作中间品。

——**跨境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



——**跨境金融投资**，主要指债权、债务关系期限不超过一年的对内对外跨境金融投资，主要是跨境证券投资。

——**跨境知识特别是技术开放**，包括知识和技术的自境外引进和向境外输出。

——**跨境制度安排**，包括跨境契约和产权保护等制度或政策安排。

跨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和跨境金融投资都是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十分成熟的领域，各界已达成相关共识，此处毋庸赘言。但关于跨境知识、技术开放，以及跨境制度开放，需要作进一步的阐释。

知识特别是技术的跨境流动，既涉及经济范畴，也涉及社会范畴和文化范畴。这是因为，知识和技术的存在是无形的，需要外化于其他有形载体或以某种方式予以记载，才易于被观察和测度。它们或外化于产品，如文化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或存在于特定载体，如人（跨境留学生、游客和移民），或被确认为特定权利，如专利等知识产权。这就意味着，对知识或技术的观察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定义。因此，本报告将通过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开放，间接观测知识和技术的跨境流动。

跨境制度安排同样如此。一般制度只有在转化为特定的跨境制度甚至跨境政策时，才易于被观测。跨境制度或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跨境行为，即对具体的跨境行为进行法律、规章和政策性的安排。为便于观测，本报告重点从跨境政策来测度跨境制度安排。

综上所述，本报告设定跨境开放为跨境经济开放和与此直接相关的跨境社会、文化开放，以及跨境政策制度的开放。

1. **经济开放**，即跨境经济开放，包括跨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跨境证券投资。

2. **社会开放**，即跨境社会开放，主要指特定的跨境人际流动，包括跨境游客流动、跨境留学生流动、跨境移民流动。

3. **文化开放**，即跨境文化开放，包括跨境文化货物流动、跨境知识产权流动、跨境专利申请、科学文献的跨境引用。

4. **开放政策**，即同前述经济、社会、文化开放密切相关的跨境政策制度安排。

对跨境开放领域的上述划分，旨在将跨境开放绩效同跨境开放政策区分开来：前三者属于跨境开放的绩效，第四个领域则是跨境开放政策。这是因为，跨境开放测度的一个要点，是明确测度对象究竟是跨境开放的绩效，还是作为跨境开放原因的政策，或者是二者的某种组合。这也是现有文献中存在重大分歧之处：政策制定者以及受政策影响较大的人士主要关注跨境开放政策，其他人士主要关注跨境开放的绩效。指数编制者可能想要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但要面临相应难题带来的挑战。